

监督式民主仍需公民积极参与政治 ——评迈克尔·舒德森《知情权的兴起：美国政治与透明文化（1945-1975）》

李辉

摘要

结合舒德森的其他重要著作，本文从写作动因、书写方法、论述主旨与所蕴含的新闻规范性主张四个方面，深入评述了《知情权的兴起》。舒德森通过知情权的兴起及其制度化的历史，论证“监督的公民身份”的合意性；通过结构-功能主义路向考察文化史，他将透明化文化阐述为政治系统自身权力均衡的产物，据此否定当下盛行的参与式民主。舒德森认为，民主的概念应随变动的实践而变。当今的民主实践逐渐走向“监督式民主”，要求充当权力审查机制之一的专业主义新闻，而非促进公民对话与政治参与的新闻。本文批判了舒德森的论证方式与新闻规范性主张，认为其“监督式民主”仍需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和公共领域才能有效实施；同时认为，对舒德森的理论话语“祛魅”是有效利用其话语的前提。

关键词

迈克尔·舒德森、监督的公民身份、监督式民主、《知情权的兴起》、新闻规范性主张

作者简介

李辉，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电邮：kk@xmu.edu.cn。

Monitorial democracy still needs citizen's active political engagement ——Review of Michael Schudson's The rise of the right to know: Politics and the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1945-1975

LI Hui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ed a detailed commentary on Michael Schudson's The rise of the right to know: Politics and the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1945-1975 regarding the author's motivation,

the cultural historical approach, purpose, and the implied journalism normative theory. This book further justified the desirability of “monitorial citizenship”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right to know. Schudson treated the story as the ultimate result of the evolving power balance within the political system itself from sociology’s structural-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 and thus denied the prevailing notion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He proposed that watching over the political system is journalism’s proper role within the burgeoning new “monitorial democracy”.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criticizes Schudson’s argument and journalism normative theory and argues that citizen’s active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public sphere is still essential for enacting the monitorial democracy he claims.

Keywords

Michel Schudson, monitorial democracy, monitorial citizenship, The Rise of the Right to Know, Journalism normative theory

Authors

Lihui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Email: kk@xmu.edu.cn.

在反思当今西方民主危机的整体语境中，新闻学界迎来了“对话转向”。舒德森的《知情权的兴起：美国政治与透明文化（1945—1975）》（以下简称《知情权》）反驳了民主危机论与“对话的崇拜”的盛行趋势，并呼吁学界关注二战后新的民主实践的事实与变动的民主概念。他批评学界对新闻的民主功能始终认识不清（Schudson, 2008a: 8; Schudson, 2014a: 95–108）。这本书继续在澄清“新闻服务民主”这一命题中“民主”的意义，并由此进一步辩护他的新闻规范性主张：当今“监督式民主”（monitorial democracy）时代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他的论证方式与新闻规范性主张构成了当今新闻学界一种重要且有争议的视角。

一、写作动因：论证并呼吁“监督的公民身份”概念

舒德森一直把自己视为尼采式的“打破偶像者”，着力反驳当今盛行的哈贝马斯式公共领域概念与对话传播观念（舒德森，2008/2010：209–233）。他批判传播学界常“把民主放置在哲学而非社会学基础上”（Schudson, 1999: 107），即依赖于理想化的民主概念而罔顾民主实际运行状况来思考民主。学界通常高估对话与公民参与在民主中的实际作用与必要性，对此进行批判是贯穿舒德森新闻学研究的一条总体核心脉络。

针对学界批判美国媒体“专注于事件、病态式的竞技思维、执迷于斗争、深度

的反政治嘲讽、强烈的社群疏离”，且“要求记者更为有效地使得民众参与政治议题”，舒德森说“我一直在为美国新闻业的这些最坏特征辩护。”他认为“新闻更为狭隘和不可爱的特征是对民主的最至关重要的贡献”（Schudson, 2006a: 23-32）。

舒德森从公民身份（citizenship）概念入手¹，厘清民主的概念和相应的新闻理念。公民身份概念内涵复杂，其核心要素为构成公民地位（status）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基于对公民权利与义务及其之间关系在理解上的分歧，公民身份概念在政治哲学中有不同的理路和传统。通常认为，公民身份概念有公民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范式：前者侧重公民身份中的公民义务一面，且视权利与义务为情境中的建构。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公共领域的对话和对共同体（community）的认同既为公民义务，亦为自由与权利得以实施和保障的前提；后者把公民身份定义为现代国家（state）主权下，公民所享有的正式（formal）法律地位，更为强调公民身份的“拥有权利”（rights-bearing）和“消极自由”的一面（Habermas, 1994; Mouffe, 1993:60-73）。相对而言，前者更为偏向公民身份的建构过程，对话是其最为核心的内在要求；后者强调把正式法律规定的普适权利与义务作为公民身份的构成。

因此，不同的公民身份范式蕴含着不同的民主与公共生活的概念。按照约翰·基恩（John Keane）的说法，“民主的历史就是公民身份概念含义不断变化的历史。公民身份与民主之间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民主所实践和反映的就是公民身份的内容”（郭忠华，2011：216）。舒德森的公民身份概念属于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范式。在创造“监督的公民身份”（monitorial citizenship）这一新概念之前，他提出过“洛克式公民身份”来表达“新的公民身份概念”（Schudson, 1994a）。在他看来，“监督”这一概念更能准确描述当代实践公民身份的现实，也更为直观地表达了当代“好公民”和公共生活的现实形象。

舒德森批判地分析了美国的公民身份概念史，并呼吁把“监督的公民身份”作为“符合我们时代的公民身份”（Schudson, 1998: 9）。《知情权》将《好公民：美国市民生活史》（以下简称《好公民》）的历史叙述向当代史的延伸，力图从历史经验矫正公民身份和民主认识上的“坏历史”。针对过于理想化美国早期民主和新闻的趋势，《好公民》呈现了美国早期民主与新闻的“去乌托邦”图景。按照美国政治转型的阶段，他描述了美国民主史上出现过的三种“好公民”和市民生活（civic life）形象：“基于同意（assent）”的公民、“基于党派从属”的公民

与“知情的(informed)”公民。前两种好公民都高度参与政治,但缺乏独立性和判断能力,也缺乏保障这种公民身份权利(citizenship rights)的制度基础。“知情的”公民身份观念是进步主义政治改革的产物,更主张具备胜任能力的一般公民积极参与政治。舒德森认为,这一公民身份观念对于公民的实际能力和行为赋予了不切实际的期待,更与现代大型、复杂民主主要依赖行政国家的专家治理的现实不符(Schudson, 2006b)。

在批判这三种公民身份概念之后,《好公民》提出“监督的公民身份”。它指的是在1950年代之后出现并取得支配地位的、“拥有权利的”且进行“监督的”公民。“监督的公民”像社区游泳池边看护小孩的父母。他们密切监视现场而非全面收集信息和时刻行动。“即便他们正在做其他别的事情,监督的公民并非缺席的公民,而是警惕的公民。”(Schudson, 1998: 311)因此,当代好公民不是且不应该是“知情的”和参与民主决策过程的公民,而是懂得捍卫自身权利的公民。当代市民生活形式也展现为,围绕自身权利对相关信息进行选择性的“扫描”以监督可能伤及自身权利的权力,并在必要的时候选择合适的行动形式。

这两本书都着重修正“知情的”公民身份概念,并呼吁“监督的公民身份”概念,旨在为当代新闻实践和研究澄清规范性基础。他认为,“知情的”公民这一公民身份观念支配了20世纪大部分时候美国新闻实践的想象(Schudson, 2007)。他着力批判的是,这一公民身份观念预设了新闻媒体应该提供公民有效参与政治和启迪公共领域对话所需的信息,由此也为新闻和公众设置了错误的民主角色,神话了记者与公民在民主中作用(Schudson, 2014b; Schudson, 2011:61)。

作者一直未把知情权作为作为《知情权》的主题(舒德森, 2015/2018: 1),而在于论证二战后美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转型所带来的新的公民身份的实践形式和制度保障,从而要求从新的公民身份和民主的概念来思考新闻。舒德森的“监督的公民身份”概念并非纯粹事实描述,更在于赋予它规范性意义上的价值偏好。由此,他认为这些发展使得美国的“民主变得更为名副其实”(Schudson, 2015: 11),侧面反驳了通过振兴公民参与政治来拯救民主的学术潮流。

《好公民》在文末才提出“监督的公民身份”概念,尚未进行事实与可行性论证。尤其是,这一概念的本质是主张公民的消极自由和个人主义权利观。在当前社会科学界将民主政治与社会的危机普遍归结为公民政治冷漠和犬儒主义的背景下,舒德森的这一描述性兼规范性的公民身份主张,遭受了学界的诸多质疑(Schudson, 2000)。其呼吁正视这一公民身份概念的合意性(desirability),以及

声称试图纠正美国历史教科书与一般性理解中对当代民主和公民身份概念的理解不足（Schudson, 2015: 19），更需要做出论证。

二、透明化文化史的结构-功能主义解释及其保守主义偏向

《知情权》解释了“监督的公民身份”及其对应的“监督式民主”（下文将论述）的实践是如何兴起和获得制度保障的。舒德森把透明化文化视为一种在美国政治、政府、法律、新闻和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所共享的“感觉的结构”，并考察了它在1950、1960和1970年代的集中兴起的事实。行政机构依法向公民披露信息、国会变得更“阳光”、商品包装提供全面信息、行政部门发布环评报告与环境诉讼公告、新闻专业主义的成熟与新闻机构的科层性（bureaucratic）提高，都产生于这一阶段。《知情权》解释了透明化这一“社会广为认可和信奉的价值观”（Schudson, 2015: 10）“为何几乎在同一时间且都在1966-1974年获得成功”，以及其背后的“一系列总体性、根本性的原因”（舒德森, 2015/2018: 2）。

舒德森以结构-功能主义路向解释透明化文化兴起的社会学动力，考察了四个看似没有关联、开先例的披露实践，即《信息自由法案》、超市标签改革、国会里的“阳光”法案、环评报告的立法起源，并追溯了它们各自的“开端”。他把这些孤立的事件通过归纳法建立联系，即政治系统内的精英政治通过推动行政机构改革与立法，创制“透明化准则及其实践获得意义的制度框架”（Schudson, 2015: 25）。具体来说，《知情权》围绕美国政治系统内的立法、司法与行政三大机构相互权力制衡与平衡，以及这些机构内的政治精英通过个人的努力、动用不同修辞和新闻媒体动员策略，实现自上而下推动立法改革与所属行政机构的制度建设，从而为诸多社会机构的披露与媒体、个人的知情权提供了制度框架，并最终使这一政治文化和行为模式制度化。

以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理论和实证主义方法考察文化史，是《知情权》的一大缺陷。这一解释方式也潜藏了舒德森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偏向。在这本文化史的方法自述中，舒德森认为这本书考察“文化史、价值观、信念或‘感觉的结构’的变动历史，把重点放在特定的个体、机构与事件上”（Schudson, 2015: 19-20）。但他的“文化”观念缺乏交往与社会建构过程的内在动力。从他对“作为文化实践的政治”的定义亦可看出，他把“实践”（practice）和“文化”都定义为“看得见”的“事实”与技术（Schudson, 2001: 423）。

舒德森的透明化文化史所呈现的是，上层系统结构自动完成对广泛的社会主

体（agency）的整合。但如社会学家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所说的，“一个网络或者一种制度并不是由于某些内在动力抑或系统的要求而自动发挥作用；它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处于不同位置上的人们做了某些事情，而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是他们定义情境的方式的结果，这一情境需要他们在其中做出行动”（Blumer, 1969: 19）。因为，“行动者的社会行动（action）是被自身建构的，而不只是启动要素的作用所产生的活动（activity）的释放”（Blumer, 1969: 55），因此文化史重在考察行动者如何在集体互动的社会过程中获得意义，以及这一意义在他们的行动中所起到的引导作用。文化史的方法也通常采取内在建构过程的视角，而不是从外在超然的（detached）观察者立场来思考社会行动、规范与文化的形成。同时，文化史通常采取“共情（empathie）与话语的路向”，“关切的是权力影响寻常百姓的诸多不同方式”，以及被忽略的主体与被边缘化的人群中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Cook, . et al. 2008: 59–62）。符号互动论社会学家痛斥舒德森实证主义的文化观与保守主义的内在关联，没有把文化视为通过符号交流与意义表达来集体建构“社会现实”的社会过程（Denzin, 1999）。

《知情权》里的公众似乎没有知情权的要求，对公民感知、参与和推动这一权利的实现关注不多；相反，它意在否定公众在透明化文化史中的作用。他认为“大众在走向开放的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低于我的预期，而总统等华盛顿的政治领袖们发挥了重要作用”（Schudson, 2015: 229）。他把重点放在“披露实践和透明化理念发展”的“预设”和“前提”上。促进知情权和透明化文化的“个人、机构与事件都不是文化变迁的认定的驱动者”。选择“个人、机构与事件”来叙述，目的在于让读者理解“透明性理念的发展的巧合与偶然”（Schudson, 2015: 20）。《知情权》故事中的具体的“个人、机构与事件”似乎都只是系统“结构”与“功能”的需要及其外在表现。

舒德森旨在说明，“预设”和“前提”才是“文化变迁的认定的驱动者”。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产生知情权（也包括其他所有权利）的这些“预设”和“前提”，就无法捍卫这些权利。舒德森对于这些“预设”和“前提”做了重点阐释，包括社会的结构与系统之间的均衡与系统—结构内精英行动者所发挥的功能性行动。

首先，政治子系统之间、政治系统与市场（经济系统）之间的权力均衡，塑造了推动知情权的相关机构和行动者的行动路径。“这些有影响力的行动者并非出于让社会变得更民主、更为开放的目的本身，而是他们所属的政府机构、内部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志向或仕途野心使然”（Schudson, 2015: 89）。知情

权兴起和制度框架建立是国会、行政部门、法院以及隶属于政治系统的新闻机构这些政治系统内部权力平衡的结果。这一点可以从《信息自由法案》、国会“阳光”法案与环评报告的立法过程中看出。舒德森也把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政治机构”（Schudson, 2002），新闻系统的权力增大与美国新闻史向“客观性”理念和“报道”这一文化形式演化的过程，是随着政治系统（确切说是权力结构）演化的结果。政治系统产生知情权，也提供新闻实践方式演变的动力和路径（舒德森，1978/2009）。政治系统演化也是与市场的互动和均衡的结果。消费领域的知情权来自于国会通过立法，赋予行政部门管理市场的权力，并促使行政机构内部改革。换言之，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互动塑造了知情权的历史，也塑造了新闻史演化的制度路径。

其次，舒德森的结构—功能主义历史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方法是通过“中距理论”（middle-range theory）来展现的。这一理论在处理文化史上存在方法和理论的缺陷，也潜藏了其保守意识形态。“中距理论”解释政治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及其支配下精英行动，需要选择可受经验验证的“社会事实”。而事实上，无论是政府信息控制过程还是信息公开的立法过程，通常能见度低，政治技巧更多是在政治密室而很少暴露在公众面前。“因为它们是在密室背后运作的，政府机构并非会如其可能的样子那样正确或者合法”（Noveck, 2015: 2）。透明政府的政策通常是政治家的政治修辞，知情权的法律与政策未必能真正保障公民知情权和塑造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方式（Rocco, 2016）。从舒德森的“中距理论”运用来看，他把政治文化狭隘地理解为一套可经验操作的、制度化的政治实践模式（practical patterns）（Schudson, 2001）；“中距理论”的可经验化的操作需要，使得他选择从“偶然的”中层人物和事件来呈现顶层系统内部的“结构—行动”关系，即他所说的不是“将军”也不是“士兵”而是“少尉们”（Schudson, 2015: 229）。他未有效处理“少尉们”与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之间互动，而是单向塑造；也没有处理系统、框架、精英行动者与普通公民之间的互动，似乎透明化文化完全因系统功能的需要而自动确立，并通过制度与法律框架自动完成对社会主体及其行为方式的塑造。舒德森的文化史显得十分干瘪。

舒德森借用雷蒙·威廉斯的“感觉的结构”这一概念来描述透明化文化。但他的概念与威廉斯的原意迥然不同。“感觉的结构”是威廉斯的文化社会学中一个关键概念，指具有具体时间性和地方性的活的社会经验。威廉斯把“感觉的结构”描述为“融汇（in solution）的社会经验”（William, 1977: 134），是代际和阶层之

间所共享的一套感知、情感和意义构成的结构。这一结构构成了整个社会群体之间“可交流”（communicable）的基础。威廉斯的这一概念蕴含了平等主义规范性主张，承担了解决现代性的一项根本困境的希望，即现代个人主义社会如何通过维持自由交流来维系社会“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并建构作为共同体的社会。实质上，齐美尔、涂尔干、韦伯、杜威、哈贝马斯、凯瑞（James Carey）等都把交流与符号的协调（coordination）作为建构社会的核心维度，回答现代性状况下“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Peters & Pooley, 2012: 402）。但舒德森的“感觉的结构”似乎是一种被社会系统所“物化”（reification）、被精英塑造并用作社会动员的意识形态力量，而非社会集体互动的结果。从建构主义的“社会”观来看，即“社会是由意义和知识构成的有序的（organized）系统”（Carey, 1998a: 202），舒德森的文化史是没有“社会”的文化史。

《知情权》体现了明显的精英主义和保守主义取向。从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的美国社会史和文化史来看，“权利”和“自由”的故事是一个意义诠释的战场，由美国社会各阶层和群体共同塑造，尤其底层群体争取自由的斗争最终成为美国自由传统的一部分（方纳，1998/2002: 4-5）。舒德森的结构-功能主义路向，源自于他力图否定1960年代社会运动所提出、并在当今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盛行的参与式民主（Schudson, 2015: 223）。《知情权》完全否定这场社会运动在推动知情权（与其他权利）中的作用。知情权的案例选择以及在“新闻业的成熟季节”的叙述上，舒德森把考察的时段都前移到社会运动之前。在“水门事件”中达到顶峰的专业主义新闻，肇始于“在水门事件之前新闻文化就已经出现的影响巨大的变化”（Schudson, 2015: 143）。

舒德森把文化史写成了他擅长的制度史。尽管一贯地叙事流畅、线索清晰，但他的理论与方法取向上，蕴含了主流社会科学长期尊奉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观与历史观。舒德森认为，政治学家与历史学家很少真正把新闻作为考察对象（Schudson, 2008a: 7; Schudson, 2008b: 181; Schudson, 2011: 64）。言外之意，社会动力来自于社会系统的主导结构的调整，尤其是主导性的权力结构中心，而不在于新闻与其他公共领域；最为根本来说，不在于民意和公众参与的力量。从而，其知情权的文化史，把“文化变迁的方式”视为一种“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的现象”，即“它们是在无可抵挡的变化浪潮中运行并且是在回应中行动”（Schudson, 2015: 20）。

三、知情权的制度化与“监督式民主”时代的新闻规范性主张

作为新闻理论家，舒德森的《知情权》意在呈现变动的民主事实和概念，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新闻规范性主张。《知情权》阐述了当代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的现实条件和实践方式的变化，提出不必以过去的民主理念为基准来衡量当前的民主现实。他提出民主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坏，只是随时代而变，错误在于“学术界把民主理解为一种政府形式（form of government），这种观念已跟不上时代”

（Schudson, 2015: 26）。在基恩提出的“监督式民主”概念流行之后，《知情权》使用这一概念对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变化做进一步阐述。舒德森提出我们生活在“监督式民主”时代，并通过知情权成为一项有保障的权利的历史，展示知情权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经验与建设民主的经验”（Schudson, 2015: 19）。

由此，舒德森呼吁关注变动的民主事实，并要求从新的民主概念来思考新闻，尤其要矫正当下盛行的把公共领域概念作为新闻的规范性主张。

“监督式民主”指的是公民更为依赖于一整套权力审查和问责机制构成的网络来捍卫自身权利。在这一新民主形式中，实践民主的方式主要不是体现在公民通过全面掌握政治信息以了解公共事务，进而通过协商形成民意，并在周期性选举中最终影响公共政策；而体现在公民在所有领域、长期不断地对掌权者进行持续监督（Schudson, 2015: 210）。舒德森承认“监督式民主”并非是取代代议制民主，而是作为代议制民主越来越重要的补充形式（Schudson, 2015: 206）。事实上，舒德森赋予了“监督式民主”予价值偏好。在“监督式民主”中，“政治”（the political）的领域不局限于、甚至主要不是围绕选举和政党活动有关的传统政治领域，而延伸到被传统政治理论划分为私人领域的地方。《知情权》中政治、消费与环保领域的透明化，反映的是后工业社会状况，即走向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多元化，以及由此诞生的诸多新的公民权利主张与形式。“政治”走向了所有影响私人权利的领域，变成了私人化的“生活方式政治”。

“政治”的概念和权利形式的变化，也导致政治参与的范围和形式的变化，从而要求重新定义“政治参与”的内涵。二战后，美国政治中“反政党”潮流使得政治超越了以选举为中心的传统。当代民主实践走向“议会外”（extra-parliament）、“超立法”（trans-legislative）或“后民主”的民主（Schudson, 2015: 197）。“私公民”时代的参与更为转向传统上被视为“非正式的”的政治参与形式和领域；并且在具体参与形式和领域上，公民选择参与影响自身权利的领域和参与形式。公民与议员、政党此类中介（intermediaries）的联系，与选举和决

策制定的政治过程的联系不再是必要的。

在舒德森看来,“监督式民主”相比传统代议制民主更具优越性。从“监督的公民身份”概念出发,公民只需要明确自身权利项目,可自由选择维权的参与形式,而不要求和期待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决定,甚至参与选举都不是民主的必要方式。“监督式民主”不仅为公民减负,也更能维护公民权利。规模和影响各异的监督机构在持续不断地监视权力,公民参与的领域增多也使得民主更具代表性,使得“监督式民主”更具活力和代表性(Schudson, 2015: 206)。这一民主形式更适合后工业社会的“私公民时代拓展的公民身份网络”状况(Schudson, 1998: 240),更为适应新的公民权利主张、更为多元化和差异化的参与形式和领域的政治现实。在这一社会状况中,把民主理解为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聚合政策共识的过程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他主张,我们应该从保护多元和差异的权利要求出发,把民主视为所有涉及私人权利领域的权力监督机制与实践形式。

显然,舒德森提出“监督式民主”目的在于辩护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并非民主的本质定义。他从“实践”来定义政治活动,明显是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政治和行为主义的行动概念(Schudson, 2001; 2007)。他的“实践”和“政治”的定义方式,驱逐了政治蕴含的对话与内在伦理反思性所构成的“实践”(praxis)维度(June, 2006: 123-144)。

舒德森从重新定义“政治”出发,批判了支配20世纪美国新闻学的错误的“政治”观念(Schudson, 2007)。舒德森基于个体与国家之间(变动的)权力关系与维护权利的方式来定义“政治”。“政治”的范围仅定义为维护个体的公民身份权利的活动。这一“政治”的概念非常狭隘与稀薄,排斥了很多属于政治的范畴;其“政治”的范围还要求能显示其存在的“事实”来定义(Schudson, 2001)。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定义方式把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和公共领域所蕴含的内在伦理价值驱逐出去。江宜桦在对西方“政治”概念史梳理后,把政治定义为“政治乃是人民为了决定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向,而表现为论辩、沟通、对抗或支配的各种行为”(应奇、张培伦, 2008: 41)。江宜桦的定义中,政治始终包含了“公共事务”“共同决定”“共同合作或对抗支配”的要素。

《知情权》按照舒德森定义“政治”的方式,即监督权力而非积极参与公共领域和政治,阐述了现代开放文化的成熟以及制度性保障,为公民介入权力审查和个体维权提供的更多方式。美国出现了诸多权力审查方式,包括政府系统内部的“审计机制与审计公报”、公民社会领域内诸多监督政府的团体和监督公民团体的团

体。他指出,“监督式民主”时代的公民政治参与,可以通过新闻媒体、泄密者与智库所构成的“政治观察台”的信息披露来监督、阻止、抗议与其自身利益有关的政策计划和实施。尤其重要的是,二战后“政治的司法化”的趋势,公民可以随时通过法律诉讼来维权,而不是仅仅依赖于传统的政治参与来捍卫权利(Schudson, 2015: 213-214)。

因此,新的民主概念对新闻的要求,不是充当民意形成和反馈的公共领域,不是提供公民全面了解公共事务和参与公共讨论与决定的信息,也不是充当公民与官员和政治机构之间沟通的管道,而是充当权力的“看门狗”。在提出“监督式民主”之前,舒德森从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概念来澄清新闻的规范性主张。他主张,新闻所服务的民主是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而非别的民主,并批判新闻传播学界盛行的对话民主和对话新闻观念(Schudson, 2008a)。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所需要的新闻不是“民粹主义的新闻”,而是“在尊重宪政主义和在保护少数族权利的代议制民主中发挥有力作用的新闻”(Schudson, 2008a: 19)。舒德森明显有意把民主与参与政治决定和分享权威脱离开来,而在辩护二战后影响最为深广的熊彼特的精英式民主定义。熊彼特认为,“民主只是为有志于竞夺权力的政治精英做出的程序制度安排”(Schumpeter, 1950: 269)。舒德森反对参与式民主和协商民主,并反驳“民主社会的媒体应该通过促进观点的自由交流以达成人民意志”这一盛行观念。他认为“实现人民意志的政府并不能提供最好的政府”(Schudson, 2008: 19)。

舒德森认为,美国政治系统的独特性及其变化决定了新闻机构在民主社会中的功能分配与实践要求(Schudson, 2006a)。“监督式民主”时代的新闻应该是,为公民实践“监督的公民身份”提供可靠和全面信息的“不可爱的新闻界”。在《知情权》中,舒德森专门用第五章论述了1960年中期之后新闻报道独立性增强和新闻编辑室中的变化。二战后行政国家的到来,行政权力与精英政治的重要性塑造了更为强大的新闻媒体。美国专业主义在这一时期成熟,以更为强大的力量充当权力的“看门狗”。在报道形式上,“语境性新闻”(contextual Journalism)作为传统报道的“重要的他者”而确立(Schudson, 2015: 152)。

有意思的是,《知情权》中的独立新闻界在推动透明化文化过程中,充当的是精英行动者的“联盟”和社会动员角色。精英改革者们也善于利用媒体的动员力量。舒德森特别强调媒体的动员功能是“通常被忽略的”民主功能(Schudson, 2008: 8)。因此,舒德森对“监督式民主”时代的新闻,还提出“新闻媒体已逐渐成为政治的竞技场,还成为政治民主的首席监督员、民意的阐释者乃至指挥者

(orchestra)”的要求(Schudson, 2015: 153)。显然,舒德森否认新闻应该充当促进公民对话、民意形成与表达的公共论坛功能,而偏向充当自上而下的垂直动员与垂直监督的功能(Schudson, 2011: 71)。他也提醒,新闻仅仅是诸多权力审查与制衡机制中的一种,无法单独起到民主的作用。因此,不能神话新闻的力量(Schudson, 2008a: 8; Schudson, 2015: 200; Schudson, 2011: 67)。

四、“监督式民主”仍需公共领域：舒德森的新闻规范性主张的缺陷

《知情权》所用的考察方法及其背后的社会架构想象已隐含保守主义价值。舒德森也试图通过“事实”描述,为新闻设置充满价值判断的规范性主张。他所尊奉的民主的“现实主义”,是1920年代到1970年代之间在美国政治学界盛行的观点(Farr, 2006: 431-445)。“现实主义”观点以民主的实际运行状况为基准来思考民主,主张把“价值”与“事实”分开,搁置对民主的价值判断。但实际上,政治思考秉持“事实”与“价值”分离的态度本身已蕴含了肯定现状的价值判断。197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后实证主义”转向已经批判了这一“中立”姿态掩藏的“不行动”、“不干涉”的社会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也批判行为科学不坦诚其真实的价值前提和知识的限度(Easton, 1971: 325-327)。

但是,无论是在规范性层面,还是事实层面,舒德森的主张都存在可商榷之处。从比较社会研究而言,舒德森的新闻史和知情权史的制度主义路径、所推导出的新闻规范性主张的普适性也同样存疑。舒德森隐含地表达了一种“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霸权,认为美国引领了世界知情权革命和新民主实践(Schudson, 2015: 57)。

就事实层面而言,舒德森所说的“成熟季节”的新闻业是否履行了“看门狗”角色,很多学者新闻学者对此持异议(Entman, 1989; Bennett, 1988; Cook, 1998)。他们认为,这一时期的新闻业与政治权力的合作关系更为紧密,媒体是“政府的一部分”(Cook, 1998: 95),从权力的“看门狗”变成了权力的“宠物狗”,造成当今公众对新闻业普遍不信任和政治犬儒主义(Carey, 1998b: 6; Carey, 2003: 71-90)。《知情权》的另一项事实判断,更触及了定义美国国体的重大争议性问题。他武断认为,美国国父们并不支持知情权和民主(Schudson, 2015: 8)。舒德森不仅没有提供权威证据,更忽略了大量美国政治思想史中关于国父们的民主思想的论述(Gordon, 1992; Andreas & Katznelson, 2008)。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法学家认为,国父们深知行政力量对信息的控制将威

胁新生的民主实验，从而通过宪法第一修正案把信息近用权作为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信息自由权的目的在于实现民主自治，并把公民参与和获得信息视为对政府权力扩张的一种制衡原则（Meiklejohn, 1961; Ivester, 1977; Emerson, 1981; Balkin, 2012）。

舒德森的民主与新闻的规范性主张也存在可商榷之处。首先，对于民主的理念与实际状况不符，舒德森把“实然”当“应然”，没有反思造成公民政治参与衰落的制度性障碍，也没有为超越现实提供引导性理念。如果说民主的过度参与不好，那么民主的过度冷漠是否就更好，舒德森对此没有回答。事实上，基恩的“监督式民主”更偏向参与式民主的核心主张。参与式民主理论家批判代议制程序民主存在回应性不足、精英化和技术专家治理造成了政治领域的“去政治化”（Hilmer, 2010）的问题。由此，基恩发现“监督式民主”更具参与性和代表性。在其实践方式上，基恩主张公民社会领域内更多的民主自治，公民通过公共协商共同参与权力审查（郭忠华，2011：197-218）。但是，舒德森的“监督式民主”并非是以参与公共协商和集体行动的方式进行，更多是公民选择参与涉及自身权利有关的领域和个人化的参与形式，尤其是法律诉讼。因此，他把知情权的意义放置在信息披露增强监督权力的能力上，而不是放置在促进公民参与公共领域的协商和民主自治上。

其次，舒德森对行政国家的事实赋予了价值倾向。行政国家为公民带来了更多的社会福利与权利（Schudson, 1998：264-275）。舒德森对于行政国家的高度科层化和依赖工具理性原则运作可能侵犯公民权利认识不足。事实上，行政国家的兴起与议会权力的衰落，本身具有集权主义与反民主倾向（Ivester, 1977：112）。舒德森把行政国家这一事实作为思考民主的规范性基础。他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观点：“公民社会与政府是有重叠的”，并批判“公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理论的学者把它们划分在政府之外（Schudson, 2015：215）。舒德森主张把国家纳入到“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范畴（Schudson, 1994b）；并认为“现在政治舞台上大量新的公民社会群体”是在立法、司法、行政这些政府机构内（Schudson, 2015：213）。尽管这一思路极具启发性，但他对自由主义的“政治国家——公民社会”二分法的政治思想传统的颠覆，需要面对诸多挑战。的确，舒德森设置了法律作为监督权力的最终保障。但是，且不论法律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关系如何、力量强弱如何，法律的公共权威及其合法性（legitimacy），最终需要获得来自政治共同体内的公民的认信和支持。哈贝马斯认为，法律与其他具有公共约束力的规范的最权威，依赖于受法律和规范约束的全体公民经公共领域内的“交往理性”而确

立。在哈贝马斯看来，二战后资本主义民主的行政国家对公民社会的侵入，导致遵循工具理性的“系统世界”对遵循价值合理性并充当构建社会凝聚力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一过程造成了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和“去政治化”，最终导致民主政治与法律公共权威的合法性危机（Habermas, 1998; McLellan, 2003: 295-296）。

同样，舒德森也把监督这些权力扩大的政治机构的责任，更为寄托在创造更多、更大权力的监督机构上。他描述了政府系统内部大量设立的“内部审计和审计公报”。但是，对于他自己描述为“狐狸守鸡舍”式的政治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舒德森也保持了审慎的乐观（Schudson, 2011: 68）。新闻机构作为对政治权力进行监督的政治机构之一，其权力也随政府机构的权力扩大而扩大，并与政府“内部审计”机构、公民社会领域的诸多权力监督机构一起，共同实施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但正如公共新闻运动所批判的，新闻机构力量的强大，不仅垄断了政治信息和议程，自身也成为了利益集团（Carey, 2003; Carey, 1999），而且高度依赖于官员和政府机构的信源（Bennett, 1988）。这些都可能威胁公民有效实施“监督式民主”。但舒德森对新闻机构“拥有自己的政治议程”并不否定（Schudson, 2015: 152）。

舒德森从“监督的公民”身份来论述知情权的功能，其根本问题在于切断了公民身份概念与公共领域的功能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诺卫克（Noveck）对信息自由路向的分析可以看出（Noveck: 2017），舒德森的知情权和透明政府路向为：公民被动知情，等待披露机构的信息，而非主动知情和通过公共参与扩展知情内容与范围；知情权的规范性本质是事后抗议和诉讼，而非促进公民参与政治；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是监督与对抗，而非政府与公民共同合作治理。但是，知情权仅以事后监督、抗议或者法律诉讼为目标，公民权利的诉求可能面临程序与政府机构的回应不足的问题，知情权对于维护公民权利的实质意义也有限。也就是说，知情权的目的更应该放置在促进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而非简单的事后监督权力。

实际上，舒德森回避了诸多主张公民政治参与和公共领域的对话的传播学者所指向的一项核心问题，即自由主义民主的合法性与社会秩序的危机。1980年代以来，政治学和传播研究中的“对话转向”，针对的是代议制民主的实质危机。“越来越多的批判的公民，他们珍视作为理念的民主，但更对他们的政治系统的表现不满，尤其是对于代议制政府的核心机构的不满”（Norris 1999: 269）。当前民主的危机在于，公民对于民主制度幻想破灭，政府漠视公民参与，也不愿意聆听和回应

民意，造成公民的无力感和缺乏效能感，最终造成公民犬儒主义盛行。

因此，知情权更应该以参与公共领域和民主为其规范性基础。民主承担了公民教育的功能，公民积极参与公共领域也是建构政治合法性、社会凝聚和训练公民政治素养的过程。“监督式民主”同样有赖于公民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公共参与和公民美德，而不是如舒德森主张的它具有为公民减负的优点（Schudson, 1994a）。

从新闻规范性主张而言，舒德森声称要“辩护美国新闻业的这些最坏特征”也需要反思。舒德森反对把公共领域概念作为新闻的规范性主张，过于从监督权力这一狭隘功能来思考知情权和新闻。这也是《知情权》这本书的核心要点之一，即知情权的制度化更强化了新闻监督权力的能力和可行。但诸多学者批判美国新闻媒体在理念和实践上伤害了美国民主制度。他们批判媒体过分专注于批判政府和暴露其缺陷，造成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犬儒主义；媒体没有起到促进公民政治学习，以及促进公民、政治家与政府机构之间的沟通功能（Robinson, 1976; Mannheim, 1991; Bennett, 1988; Entman, 1989; Carey, 1998b）。也认为，媒体是造成政治生活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Cook, 1990）。

显然，舒德森承认且赞美“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的社会事实与价值观。但是，在多元主义与权利形式差异日渐增多的社会如何创造社会秩序与规范上，舒德森显然轻视了人类通过理性沟通创造规范和缓解暴力的可能。他把社会秩序过于放置在霍布斯式的“利维坦”上，即通过拥有最高权威的国家和法律来保证各为私利而争斗的社会不陷入失序。但是，如凯瑞所说，放弃了通过对话的民主来创造社会秩序和公共权威的努力，“就必然会创造出霍布斯式国家”，公民自由亦受“官僚政治”所支配（Carey, 1997: 254, 271）。因此，哈贝马斯式公共领域的规范性主张虽有过度理想化之嫌，但依然不能轻易否定和放弃。它寄托了人类通过理性、平等对话来建构社会秩序的理想。尤其在当代公共领域碎片化的时代，我们更有必要思考对话之于社会整合与民主制度的合法性的价值。

另外，舒德森声称《知情权》“是为理解数字时代写下的中肯序言，并且披露一些不为人知之事”（Schudson, 2015: 27）。但他认为，理解数字新媒体的民主潜能，必须以“监督的公民身份”作为基准。“如果新数字媒体要融汇到新的政治民主，就必须把它们与公民身份的严肃理解联系起来，如果我们简单地重复知情的公民这一老的观念的话，数字媒介就无法被汇入到新的政治民主”（Schudson, 2003: 49）。舒德森对于数字媒体的民主功能的这一看法，同样在反驳把数字媒体的民主功能放置在扩大公民参与上。他认为透明化文化是互联网问世之前的制度建设带来（Schudson, 2015: 27），这一制度基础也设定了新媒体的民主功能

的路径。他对于互联网的民主价值的思考，限于作为信息传递的工具上，互联网扩展了信息提供和获取的机会。在他看来，“传播丰裕”的社会，公民和记者容易通过《信息公开法案》、“政治观察台”与民调机构等公布的各式各样的数据（Schudson, 2010）。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肯定互联网极大拓展了透明性。虽然，他否定“电子民主”的乐观主义（Schudson, 1992），但依然可以看出，舒德森在技术与政治进步的关系上所持的技术进步论。从“监督的公民身份”来看待技术的政治价值，技术的线性进步的确提供了公民更多信息手段，方便了公民有效地实施“监督的公民身份”。

但仅从信息传递的工具，而非技术建构主义来思考技术对知情权的赋能是不够的。他的“监督的公民身份”概念过于单薄，无法有效理解、也难以有效捍卫知情权。一方面，舒德森没有理性审视知情权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的命运及其有效捍卫之策。舒德森对政治权力和密室政治隐瞒信息、甚至释放错误信息的趋势讨论不足，更没有讨论国家的秘密监控、计算化宣传（computational propaganda）、算法塑造公共意识对包括知情权在内的诸多公民身份权利和自主的主体（autonomous agent）的明显威胁；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为公民参与并推动政府走向更为透明带来了机会，数字技术赋能的“对话的治理模式”为维持政府的合法性所提供的新的方式（Noveck, 2015: 30），舒德森对此都认识不足。同时，鼓励公民通过积极参与、主动使用知情权，更有助于公民在网络公共空间行动，有助于公民辨识（identity）和扩展新的权利、促动制度和政治文化变革。

在另一个层面上，舒德森也忽略了知情权的实质享有有赖于公民参与公共领域。知情权、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不只是消除法律限制的问题，也是一项社会心理问题。只有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和承担公共责任才能驱动积极行使知情权。知情权的实质享有和使用，需要公民感知到自由、宽容并鼓励表达和协商的社会环境。在公民感到充满仇恨、狭隘和政治冷漠的社会，可能会抑制公民使用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意愿。这一社会环境有赖于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对话来建构。实际上，缺乏参与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正是“监督的公民身份”与知情权无法有效实施的障碍之一。在“媒介化”和“后真相”社会，公民个体很难仅凭个人认知能力对外在信息作出理性判断。算法与精准信息推送对于社会注意力分配的影响和“信息茧房”效应，对于公民认知具有强大影响。信息冗余与私人化的信息消费，加剧了当代公共领域的碎片化和个人主义化，也强化了中心化的（centralized）的信息输出的宣传效应。而公共领域所产生公共意见，有助于克服个体私人化的信息消费受到的宣传偏见的影响，也有助于社会的整合。

五、结论：重视公民参与的内在政治价值

《知情权》意在辩护舒德森所主张的“对话不是民主之魂”（舒德森，2008/2010：209-233）。知情权的制度化和透明化成为政治文化，源自于政府机构及其内部精英自上而下推动，而非社会运动和公民参与。在现代复杂、大型民主社会，公民权利的扩展和保障更为依赖国家权力。相比要求公民积极参与政治过程的传统民主而言，“监督式民主”具有更为灵活、多样的权力审查机制，更适应国家权力扩张的现实，也更能捍卫当今越来越多和差异化的权利要求。知情权的制度化为实施“监督式民主”提供了制度基础，也强化了新闻机构充当权力审查机制的要求和可行性。因此，他呼吁从新的民主概念来思考新闻，放弃把促进公共领域的对话和民主参与作为新闻的规范性主张。

但笔者主张，在充分重视舒德森的思想资源的同时，应当从美国政治语境对之进行批判分析。如果公民参与政治和公共领域不足，知情权可能无法实质享有和扩展，“监督式民主”也将无法有效实施。知情权、透明文化和新闻业的规范性取向依然有必要放置在公共领域的理念上，并重视公民参与的内在政治-伦理价值。

（责任编辑：吴欣慰）

注释 [Notes]

1.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Citizenship”在政治学中已普遍被译为“公民身份”。但在舒德森的诸多中译本著作及访谈中普遍被翻译为“公民权”。这一翻译很容易与“民权”（civil right）这一概念混淆。“公民身份”与“民权”、公民权利既有关系但又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鉴于“公民身份”这一概念已是1990年代以来政治学和传播学中最为核心重要的概念之一，因此有必要提出这一翻译的问题。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埃里克·方纳（1998/2002）。《美国自由的故事》（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郭忠华（2011）。《变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与吉登斯基恩等人的对话》。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应奇、张培伦编（2008）。《厚薄之间的政治概念：〈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文选》（卷二）。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 迈克尔·舒德森（1978/2009）。《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迈克尔·舒德森（2008/2010）。《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贺文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迈克尔·舒德森（2015/2018）。《知情权的兴起：美国政治与透明文化（1945-1975）》

(郑一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Balkin, J. (2012). The First Amendment is an Information Policy. *Hofstra L. Rev.*, 41(1), 1.
- Bennett, W.Lance. (1988).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2nd). New York, NY: Longman.
- Blumer, H.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arey, J. (1974). The Problem of Journalism History. *Journalism History*, 1(1), 3-5, 27.
- Carey, J. (1997). *A Critical Reader*, Eve Stryker Munson & Catherine A. Warren (Ed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arey, J. (1998a). Cultural Studies and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Notes in Critique and Tribute to Norman Denzin.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25, 199-209.
- Carey, J. (1998b). The Decline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36(6), 6.
- Carey, J. (1999). In Defense of Public Journalism. In Theodore Glasser (Eds.), *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 (pp. 49-66).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 Carey, J. (2003). American Journalism on, before, and after September 11. In Barbie Zelizer & Stuart Allan (Eds.), *Journalism after September 11* (pp. 71-90). London, UK: Routledge.
- Cook, J. et al. (2008). *The Cultural Turn in U.S. Hist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ok, T. (1990). *Making Laws and Making News: Media Strategies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Cook, T. (1998). *Governing with the News: The News Media as a Political Institution*.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nzin, N. (1999). From American sociology to cultural studies.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 117-136.
- Easton, D. (1971). *The Political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 New York, NY: A.A. Knopf.
- Emerson, T. (1981). The Affirmative Side of the first Amendment. *Georgia Law Review*, 15(4), 795-849.
- Entman, Robert M. (1989). *Democracy without Citizens: Media and the Decay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rr, J. (2003).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In Terrence Ball & Richard Bellam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pp. 431-445).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ame, D. & Lukes, S. (1963). The New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14(2), 156-177.
- Habermas, J. (1994).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 Theory: Three Normative Models of Democracy. *Constellations* 1(1), 1-10.
- Habermas, J. (1998).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 Democracy. Trans. W. Reh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ilmer, J. (2010). The State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tic Theory. *New Political Science*, 32(1), 43-63.
- Ivester, D. (1977).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Know. *Hastings Const. L.Q.*, 4, 109-163.
- June, J. (200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terpretive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Kalyvas, Andreas, & Ira Katznelson. (2008). *Liberal Beginnings: Making a Republic for the Modern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cedo, S. (1999). *Deliberative Politics: Essays on 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nheim, Jarol B. (1991). *All of the People, All the Tim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Politics*. Armonk, NY: M. E. Sharpe.
- McLellan, D. (2003). Western Marxism. In Terrence Ball, & Richard Bellam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pp. 282-298).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iklejohn, A. (1961). The First Amendment Is an Absolute. *Sup. Ct. Rev.*, 245-255.
- Mouffe, C. (1993).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London: Verso.
- Nerone, J. (2015). *The Media and Public Life: A History*.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 Norris, P. (1999).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veck, S. (2015). Smart citizens, smarter state: The technologies of expertise and the future of govern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oveck, S. (2017). Rights-Based and Tech-Driven: Open Dat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Yale Human Right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19 (1), 1-45.
- Peters, J.D. & Pooley, J. (2012).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In George Ritzer (Eds.). *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ology* (pp. 402-416). New York, NY: Wiley-Blackwell.
- Robinson, J. (1976). Public Affairs Television and the of Political Malais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0), 409-442.
- Rocco, P. (2016). Open govern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public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94(3), 846-853.
- Schudson, M. (1992). The Limits of Teledemocracy, *The American Prospect*, 11, 41-45.
- Schudson, M. (1994a). Voting Rites: Why We Need a New Concept of Citizenship. *The American Prospect*, 19, 59-68.
- Schudson, M. (1994b). The Public Sphere and Its Problem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otre Dame Journal of Law,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8), 529-546.
- Schudson, M. (1998). *The Good Citize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ivic Life*.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Schudson, M. (1999). Reply to Chris Schroll.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6(1), 107.
- Schudson, M. (2000). Good Citizens and Bad History: Today's political Ideal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4(1), 1-19.
- Schudson, M. (2001). Politics as Cultural Practic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8(4), 421-431.
- Schudson, M. (2002). The News Media as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5, 249-269.
- Schudson, M. (2003). Click here for democracy: A history and critique of an information-based model of citizenship. In Jenkins H & Thorburn D (Eds.). *Democracy and New Media* (pp.49-59).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Schudson, M. (2006a). The Virtues of an Unlovable Press.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76(1), 23-32.
- Schudson, M. (2006b). The Trouble With Experts—And Why Democracies Need Them. *Theory and Society*, 35 (5/6) 491-506 .
- Schudson, M. (2007). The Concept of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U.S. Journalism,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4 (2), 131-142.
- Schudson, M. (2008a). News and Democratic Societ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e Hedgehog Review*, (10), 7-21.
- Schudson, M. (2008b). Public spheres, imagined communities, and the underdevelope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journalism. In B. Zelizer (Eds.). *Explorations in communication and history* (pp. 181-189).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chudson, M. (2010). Political observatories, databases & news in the emerging ecology of public information. *Daedalus*, (139), 100-109.
- Schudson, M. (2011). Tocqueville's Interesting Error: On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In George C. Edwards III, Lawrence R. Jacobs, & Robert Y. Shapi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Media* (pp. 61-73).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dson, M. (2014a). How to Think Normatively About News and Democracy. In Kate Kenski & Kathleen Hall Jamieso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p. 95-108).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dson, M. (2014b). The Concept of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U.S. Journalism.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4), 131-142.
- Schudson, M. (2015). *The Rise of the Right to Know: Politics and the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1945-1975*.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mpeter, J. (1950).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 Williams, R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od, Gordon. (1992).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NY: Knopf.